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02年立项课题 (02YB128)

湖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
2002年立项课题 (02C100)

刘禹锡

朗州诗文研究



刘梦初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02 年立项课题(02YB128)

湖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 2002 年立项课题(02C100)

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

刘梦初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

刘梦初 著

责任编辑 谢 剑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410083

发行科电话:0731-8876770

传真:0731-8710482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装 中南大学湘雅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12千字

版 次 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61-654-4/H·141

定 价 18.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请与经销商调换

劉禹錫朗州詩文研究

霍松林題

序

案头放着一部书稿和两封会议邀请函。书稿是刘梦初同志新著《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即将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因为我去年曾在岳麓书社出过一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所以梦初君希望我能为他的新著写上几句话。至于两个邀请函，一个来自将于今年8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另一个是12月将于广州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12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它们的主要议题则分别是“面向新世纪的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和“面向新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的思路 and 方向”。我还没有找到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思路，会议论文茫无头绪，但对于刘禹锡却还不算陌生，自然首先是先拿起了书稿。“书当快意读易尽”。用了大约一天半的时间，我一口气把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粗粗翻阅了一遍，掩卷沉思，觉得大有所得。

梦初君的《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综论”共十一章，除了论述刘禹锡贬来朗州的背景和经过外，还结合了刘禹锡诗文评析介绍了古朗州常德的山川景物、民俗风情、社会经济、古迹胜概，论述了刘禹锡在朗州时期的政治态度、哲学思想、文学成就，下篇“考释”两章则对刘禹锡诗文系年，作品中地理、古迹、人物做了考证。作者长期生活工作在常德市，曾经参与了“常德诗墙”等地方文化胜迹的建设活动，熟悉朗州的山川草木、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加之文笔生动流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十分引人入胜。读完此书，读者对于刘禹锡贬来湖南“枉

“渚逢春十度伤”的一切，当有十分生动真切而又细致深入的了解了。不过，我以为此书给读者的启迪实当不止于此。

综观全书，我觉得作者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既认真真地在做学问，但又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前者表现在作者在提高书稿学术层次方面的切实努力，而后者则主要表现在作者在研究中对乡土和现实的密切关注。

刘禹锡主要是一位文学家、诗人。书稿以“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为题，重点自然放在文学方面。但作者的视野却十分开阔，表现在：第一，作者的注意不局限于刘禹锡朗州诗文本身，而是刘禹锡的一生和全部作品；其次，作者不仅关注刘禹锡的文学创作，而且将刘禹锡的作品放在一定的背景中做全方位的考察，由文学的研究拓展到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再次，作者既广泛涉猎了前人及今人的有关论著，又不满足于别人做出的有关某些历史事实的结论，而是将各家之说综合比较，重新审视，将文献史料考据和理论分析结合起来，使自己的结论建筑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例如，在考察刘禹锡初贬朗州的行程时，作者不仅详细考察了刘禹锡一生中行经荆湘的多次行程，还仔细考察了唐代的驿递制度和官员贬谪情况以及永贞革新前后的政治形势，这才对刘禹锡永贞元年被贬南行的路线、时间和作品系年做出自己的判断，展开论述。由于作者对所论对象有较为全面的考察和透彻的理解，对于唐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有较精细的认识，厚积而薄发，这样才能对所论对象有较准确的评价和较深入的论析，时有新见，有效地提高了本书的学术品位。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研究一千二百年前的文学家，作者的眼光并未局限于文学一隅，更没有放松对现实和人生的关注，而是有意识地将古代的研究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书稿在论《调瑟词》时，指出刘禹锡认为各阶层利益都要顾及，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实现协调发展；论《咏史二首》时，强调刘禹锡对于“官

员的务实精神和实际才干”的肯定；论《救沉志》时，指出刘禹锡强调“除恶即是为善”的普慈观，表现出“独特的佛教观念和宗教意识”；论《答饶州元使君书》时，指出作者“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的主张，“语语针对现实，条条皆可实践”，其中强调“徒木之信”、“置水之清”、“铄箠之机”，实际上是“主张诚信精神、民本思想和监督机制，三个方面互相倚靠为用，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仍然有现实的启发作用和教育意义”。这些不但增进了人们对刘禹锡的了解，而且大大拉近了古代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至于作者在各章中诗文的论析，满腔热情地向读者展示了沅澧流域的悠远历史、旖旎风光和多元文化，而且专辟“刘梦得来诗境阔”一章集中论述刘禹锡被贬南来对湖南区域文学创作的影响，就更表现出作者浓烈的乡土之情，书稿本身就是常德市乃至湖南省经济文化建设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案头搁置已久的会议邀请。大约从1996年开始，关于世纪学科回顾与前瞻的文字就已经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报章杂志上了。此后，总结20世纪学术发展史的著作也陆续出版，甚至有洋洋百万字者。但是，直到现在，不仅报刊上的讨论余波荡漾，而且仍然是学术会议的热门话题，这原因恐怕不能仅用世纪的新旧交替来解释。20世纪我国古代文史研究经历了转型、发展、停滞、再发展的曲折过程，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电脑和互联网迅速普及，大容量可检索的电子光盘读物的出版，秘籍孤本因“善本再造”而广为流通，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所需文献史料点击鼠标可得，冯友兰先生“全真透活”的四字真言（史料“搜集要全，鉴辩要真，理解要透，动用要活”）中的“全”字似乎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真”、“透”二字也比较容易做到，这就给古代文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逐步取代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一切图书都成了商品，学术著作不再能保持超然的地位，纯学术的研究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梁启超学术除求真之外别无目的的说法似乎有些动摇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既然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学术研究何去何从？我想，为着学术的生存和发展，那就必须努力提高研究的水平和层次，使学术研究既能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而又不忘当代社会现实，尽可能地适应社会的要求。我觉得，正是在这方面，梦初君的《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一书提供了一份颇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的答案。

我和梦初君认识已久。2001年秋，在湖南文理学院担任党委宣传统战部部长的梦初君来电话表示，希望到当时的湘潭师范学院做半年的访问学者，完成他手头的“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课题。我以为他身兼要职，公务繁忙，访学不过是说说而已，于是以个人能力有限、学校条件太差为由婉拒了。不料过了几天，他就来到我的家中，说已经带了行李，在附近租了一间民房安顿下来。一所大学的中层领导如此“降尊纡贵”地来求学，实在使我深为感动。我所在的古文献研究所办公室离食堂和图书馆都很近，书籍和家具不多，还有一些空间，于是，我从家里拿来一张钢丝折叠床请他搬进学校来住。这倒不是为他节约开支，而是希望能给他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一点方便。果然，他住进来后，息交绝游，白天跑图书馆查阅资料，晚上在房间里伏案读书写作，两个多月就这样悄悄过去了。可不久，梦初君来告，他被安排任湖南文理学院党办、院办主任，必须回校履新。他带上未完的书稿和一大堆笔记资料回了常德，此后，音问渐疏。我想，他担任一所大学的核心枢纽部门领导，工作繁重，写书一事大约是流产了。不料，两年以后，一部30多万字的打印稿竟赫然摆在了我的面前。不难想见，作者为此付出了怎样的辛勤和心血。对比起来，一些心浮气躁的青年学子，可以望风而知愧了。

放下书稿，突觉阴沉的天空似乎放晴，于是想到久违的明湖边转转，放松一下。当我信步在林荫道上，这才意外地发现，一向静谧的校园竟然人涌如潮。原来，一年一度的樱花已经烂漫如霞，又是“无人不道看花回”的季节了。看着来往行人面上的笑容，我忽然想到，“万象已随新运转，百花争向好春开”，梦初君的《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不就是新世纪学术研究百花园中一朵迎风开绽的新花吗？

陶 敏

2004年3月30日写于湖南科大东苑寓所

目 录

上篇 综 论

- 第一章 “亦知或被才名折”——刘禹锡贬谪朗州的背景与经过 (1)
- 第一节 中唐积弊与“永贞革新” (2)
- 第二节 才名累折与朋党物议 (8)
- 第三节 南下路线及途中诗歌 (17)
- 第二章 “枉渚逢春十度伤”——刘禹锡在朗州的谪居生活 (28)
- 第一节 城隅孤栖 (28)
- 第二节 忧愤多病 (31)
- 第三节 葬马龙泉 (34)
- 第四节 丧妻悼亡 (36)
- 第五节 向佛亲禅 (41)
- 第六节 交友读书 (47)
- 第三章 “城边流水桃花过”——刘禹锡脚下的朗州山水 (53)
- 第一节 南国风候 (53)
- 第二节 水乡烟波 (58)
- 第三节 枉渚孤峰 (63)
- 第四节 阳山神庙 (69)
- 第五节 桃源洞天 (73)
- 第四章 “氓谣俚音俚风什”——刘禹锡眼里的朗州风俗 (80)
- 第一节 巫风淫祀 (81)
- 第二节 江岸踏歌 (85)

第三节	游女采菱	(91)
第四节	龙舟竞渡	(95)
第五章	“市桥广陌资渔猎”——刘禹锡笔下的朗州经济	(103)
第一节	畚田与果茶	(103)
第二节	打渔与淘金	(111)
第三节	市场与商贾	(115)
第四节	机械与技术	(119)
第六章	“山川风物”“骚人所赋”——刘禹锡诗文中的朗州古迹	(122)
第一节	善卷高风	(124)
第二节	两汉古城	(127)
第三节	伏波遗迹	(132)
第七章	“蹈道心一”“俟时志坚”——刘禹锡朗州时期的政治态度	(137)
第一节	坚持统一的国家观念	(138)
第二节	坚持革新的政治主张	(141)
第三节	坚持抗争的耿介气节	(150)
第四节	坚持进取的执着精神	(156)
第八章	“阴助教化”“总持人天”——刘禹锡朗州时期的宗教观念	(163)
第一节	“阴助教化”的“补治”观	(164)
第二节	“虚静致慧”的“陶冶”观	(170)
第三节	“救善去恶”的普慈观	(174)
第四节	慕道诗歌与羡仙情怀	(177)
第九章	“天人交胜”“日新为道”——刘禹锡朗州时期的哲学思想	(182)
第一节	刘禹锡天人观的形成与提出	(183)
第二节	“天人相胜还相用”的内涵与实质	(190)

第三节	“主张其时”、“日新为道”的发展观	·····	(199)
第十章	“焦思穷笔精”——刘禹锡朗州创作的艺术开拓	·····	(203)
第一节	“立言”、“体物”的文赋	·····	(204)
第二节	“讽托幽远”的寓言诗	·····	(215)
第三节	“含思婉转”的民歌体	·····	(225)
第十一章	“刘梦得来诗境阔”——刘禹锡朗州诗文的地方渊源与影响	·····	(240)
第一节	对屈骚的继承与发展	·····	(241)
第二节	对武陵后人的沾溉与影响	·····	(268)
下篇 考 释			
第十二章	刘禹锡朗州作品系年举证	·····	(279)
第一节	可以准确系年的朗州作品	·····	(280)
第二节	不能准确系年的朗州作品	·····	(304)
第三节	尚有异议的朗州作品	·····	(319)
第十三章	刘禹锡朗州作品地理、古迹、人物考	·····	(336)
第一节	朗州地名考	·····	(336)
第二节	朗州古迹考	·····	(352)
第三节	朗州人物考	·····	(357)
附录一	刘禹锡朗州作品检索	·····	(365)
附录二	刘禹锡任职变迁表	·····	(373)
附录三	近十年刘禹锡研究论文目录	·····	(376)
附录四	参考书目	·····	(386)
后 记	·····	·····	(390)

上篇 综 论

第一章 “亦知或被才名折”

——刘禹锡贬谪朗州的背景与经过

中唐文坛呈现着诗文并举、新变迭出的显著特征，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星级大腕人物多能散文与诗歌兼擅，刘禹锡（772～842年）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名家大腕之一。他至今存诗800余首，文240多篇。其地位虽不及开宗立派、领袖群伦的韩愈、白居易那样显赫，但他的诗文皆能在韩愈、白居易之外别树一帜，独领异军，影响亦十分深远。《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其诗则含蓄不足，而精锐有余，气骨亦在元、白上，均可与杜甫相颉颃。”此言虽非尽是笃实中肯之论，但也足见后人对刘禹锡的景仰推崇之意。

刘禹锡是中唐著名的文章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同时也是最为命途多舛的诗人。“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①，他被连续贬谪在朗州、连州、夔州、和州这些远州边郡，“二十余年作逐臣”（《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

^① 本书凡引《刘禹锡集》只注篇名，不引集名卷次。

成为“二十四年流落者”(《杏园联句》),这大概是唐代 300 多年中贬期最长的一位诗人了。56 岁时,做过短暂的四年京官之后,又以 60 高龄被放外任。虽然这回刺领的苏州、汝州、同州都是上州,官阶也在四品以上,但比起他三十出头就担任过的朝中郎官之类的清要之职来说,仍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感叹“应怜三十载,未变使君名”(《酬令狐相公首夏闲居书怀见寄》)。直到 65 岁以后,朝廷才给了他一个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朝中闲职,他仍然没有得到施展济世之才的机会。一代俊才就在这样的周折遭回中度过了他怨愤而又无奈的一生。

命途多舛对于诗人来说自然是一种不幸,但对于诗歌来说却又是一种幸运,刘禹锡的好诗好文就是从贬谪朗州开始的。要问他是怎样来朗州的,那还得从他参与的“永贞革新”和中唐的时代背景说起。

第一节 中唐积弊与“永贞革新”

公元 755 年发生的“安史之乱”是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八年的战乱,很快将和乐繁华的盛唐气象扫荡一空。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涂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纵横交织、日益激化,内忧外患,战事频繁。唐王朝国运日颓,国势日蹙。

中唐最为严重的两个政治问题是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藩镇割据的形势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就整个政治局面讲,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加剧。“安史之乱”的结束,并不标志着对内乱分子的彻底根除,因为,这个局面本来是代宗允准某些安史旧部表请河北诸镇节度使换来的,因而这种安定也必然是暂时的。骄横惯了的藩镇旧部一旦得到唐王朝中央的正式任命,更加恣肆无忌。他们互相联姻,结党营私,收罗旧部,修城练兵,一心扩充势力范围;他们扣留供赋,自命官吏,父死子继,擅称名位,私行杀戮,互相攻伐,根本无视朝廷节制。代宗

大历三年(768年)七月,幽州兵马使朱希彩杀节度使李怀仙自称留后,朝廷派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遣将讨伐,为其所败,不得已授朱希彩领幽州留后,改幽州长史,充幽州卢龙节度使。不仅正式承认了其身份的合法性,而且赋予了其更大的军权。大历九年(774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引兵袭取相州、洺州、卫州,后在各路官军围剿下兵败,便遣使上表谢罪,代宗下诏,赦其罪,复其官爵。大历十一年(776年)他又攻打滑州,进军汴州,败后再次上表谢罪。代宗又一次复其官爵,仍为魏博节度使。朝廷的这种软弱姑息,无疑给了那些拥兵自重的藩镇以鼓励,他们没有败亡的顾虑,因为随时可以得到朝廷的宽宥抚慰甚至奖赏。所以他们肆无忌惮,动辄起兵要挟朝廷。至于分割一旁,大权独揽,不听节制,早已经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了。至大历十二年(777年),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据青、淄、徐、郟等十五州,田承嗣据魏、博等七州,李宝臣据恒、易等七州,梁崇义据襄、邓等六州,皆不用朝廷法令,自专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等,而“上宽仁,一听其所为”(《资治通鉴》卷二二五),软弱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被许多史学家称为“太平之主”的唐德宗,也同样出于恐藩心理,对天下有兵之处惟姑息忍让为是,其太平不过是以朝廷的屈辱和优厚的待遇换得了藩镇的暂时臣服。建中三年(782年)起,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互相连结,抗拒朝廷,而淮西一直为李希烈所割据,对东都洛阳构成严重威胁。德宗却于784年改元之际,下诏罪己,并有其罪。史谓“自安史以后,迄至贞元,朝廷多务优容,每逢擅袭,因而授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然而,其优容的结果是,河北诸镇的拥兵割据此起彼伏,还不时波及他处,六十年间,几无宁日。

唐宪宗是有“中兴之主”美誉的君王,他在李绛、杜黄裳等有识宰辅的推动下,曾多次发动平藩战争,先后在元和十二年(817年)、元和十四年(819年)平定了淮西吴元济、淄青李师道等强藩,有力地打击了藩镇的嚣张气焰。但是他在政治上的保守和对

革新派的压抑，使他也终于未能根除藩镇痼疾，更未能消除其滋生土壤，刷新整个政治局面。到后期，他信从宦官，佞佛求仙，以致被宦官陈弘志所弑。所谓的“中兴”之望，也就如过眼云烟，瞬即飘逝了。

中唐另一个严重的政治危机是宦官专权。肃宗、代宗之朝，先是有李辅国、程元振弄权朝中，后又有鱼朝恩总统禁兵，为天下观军容使。继而代宗派宦官充任各路军队的监军，实权常常超过节度使。宦官掌握军权，又往往代行诏令，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左右朝廷，独擅政权的局面。不仅朝野官民得看其眼色行事，就是皇帝也得听其咳唾处政，否则，不是擅行废立，就是图谋弑篡。宝历三年(827年)，宦官刘克明、苏佐明杀敬宗李湛，准备拥立绛王李悟“权勾当国事”，结果，李悟又被宦官王守澄、杨承和所杀，复立江王李涵，是为文宗。皇帝的废立完全取决于宦官的好恶了。皇权皇位已沦为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儿戏，唐王朝还有什么威势可言？

在这种藩镇跋扈于外，宦官专横于内的情况下，皇帝已成为一种傀儡或象征。中央集权的削弱，使社会长期处于分裂混乱的局面，国家整体的综合实力江河日下，回纥、吐蕃乘机觊觎中原，不断掠边陷城，人民不堪其苦。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犯边，宦官程元振居然隐情不报，私自阻挠郭子仪出兵抵抗，致使吐蕃径入长安，代宗出走陕州，京师长安在不到十年中第二次陷落。内外交战，久罹兵祸，彼此攻防，反复践踏，使关内畿辅以及河北、河南素称农桑富庶的广大地区变得满目疮痍。平叛名将郭子仪目睹惨状，上书朝廷：“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站噪。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一方面是戍边平叛，连年征战，要耗费大量资财；另一方面

因为战火兵燹，豪强侵吞，人民无法安居乐业，从事生产。于是朝廷府库耗竭而州县贡赋锐减，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李吉甫曾经奏称：“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计十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辈也。”（《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宪宗元和六年”）这样一个三七开的比例，足以让我们想见，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劳动人民的负担沉重到了何等地步！

尤其严重的是，在如此严酷的形势下，中唐的朝政腐败却日甚一日。宪宗元和初年，皇甫湜在《制策》（《皇甫持正文集》卷三）中历数了种种时弊，他指出：宦官们“掌王命，握兵权，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实际专断了君王权力；将帅则“怙众以固权位，行贿以结恩泽”，而“知兵者亦寡”；“朝廷之号令，有朝出而夕改者；主司之法式，有昨破而今行者”；“公卿大夫，则偷合苟容，持禄交养，为亲戚计迁除领簿而已”，尽干些假公济私的勾当。更有甚者，贪官污吏，巧取豪夺，致使“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悉是编户”。而朝廷虽有监察机构和大批官员，却没有起到弹劾纠察的作用，所谓“谏诤之臣备员，不闻直声；弹察之臣塞路，未尝直指”。总而言之，“法未修明”，“政未光大”，黑暗而腐朽。后来的刘蕡，在应试贤良方正科的对策中（《全唐文》卷七四六），对中唐弊政概括得更为简明，指陈得更加痛切。以为撮其大端，一为宦官专权：“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名，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以致“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持废立之权”；二为方镇跋扈：“政刑不由于天子，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三是公卿徇私：“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贤”，任人惟亲，惟利是图；四是经济凋敝：“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土崩之势，忧在旦夕”。这虽然是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时的言论，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进入中唐以来，社会形势大略相同，并非文宗一朝方才如此。

总之，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边患四起，民生凋敝，种种危机